

四川历代文学家传

巴蜀文苑英華

何崇文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历代文学家传

巴蜀文苑英華

何崇文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成礼

封面设计：夏扬金

巴蜀文苑英华

何崇文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4字数234千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00册

书号：10118·818

（压膜本）定价：1.45元

《巴蜀文苑英华》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涌现了为数众多的作家，产生了浩如烟海的作品，这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四川古称华阳，一名巴蜀。溯自文翁守蜀，文风丕振，辞人才士，辈出蜂起，名篇佳制，充溢坟籍。汉代有司马相如，他是著名的辞赋家；唐代有李白，这位大诗人是在巴蜀的土地上成才的；宋代蜀中文化空前繁荣，出现了苏轼这样的文学大家；明清又有杨慎、张问陶等，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而历代巴蜀文苑中的其他有为之士，也都对祖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他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从这些精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继承文化遗产对繁荣和发展文艺事业的重要作用。

要继承首先必须了解，要了解就需要比较系统的有关书籍。《巴蜀文苑英华》一书对蜀中历代的四十八个文学名家撷其精

英，汰其芜秽，既介绍其生平事迹，也评析其主要作品，因此，本书既是面向广大读者的知识性读物，又可作为研究四川历代文学使用的专业参考书。编写此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它能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应有的作用。

魏兴南 一九八三年二月于西南师范学院

目 录

司马相如	何崇文□	1
王 褒	何崇文□	9
扬 雄	贺瑞君□	13
李 尤	何崇文□	18
秦 宓	周显忠□	21
谯 周	周维群□	24
李 密	刘启芬□	27
陈 寿	刘启芬□	31
陈子昂	贺瑞君□	35
李 白	胡熙绩□	41
薛 涛	吴 柯□	52
雍 陶	侯昌吉□	61
唐 求	傅德岷□	66
李 珣	曾卿秀□	70
花蕊夫人	赵云中□	75
鹿虔扈	侯昌吉□	78
欧阳炯	栗多桂□	81
孙光宪	魏运芳□	87

田 锡	彭应义□	90
范 镇	牟宗福□	99
苏舜钦	栗多桂□	105
苏 洵	金国永□	113
张 俞	李淑清□	124
文 同	周维群□	127
苏 轼	沈瑞丰□	134
苏 辙	沈瑞丰□	148
苏 过	沈瑞丰□	157
宇文虚中	曾卿秀□	166
韩 驹	董小玉□	173
张 浚	彭应义□	184
李 石	侯昌吉□	192
李 焘	董小玉□	198
王 灼	何崇文□	209
张 栻	彭应义□	216
张 栻	傅德岷□	229
李心传	牟宗福□	233
魏了翁	甘大祥□	238
虞 集	赵云中□	245
杨 慎	龙泉明□	250
黄 峨	任承佑□	260
费 密	魏运芳□	266
唐 甄	牟宗福□	270
彭端淑	栗多桂□	278
李调元	魏运芳□	282

张问陶	赵云中□ 287
杨 锐	杨长虹□ 300
刘光第	杨长虹□ 305
邹 容	李淑清□ 313
后 记	315

司马相如

何崇文 □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7），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人。善辞赋，古代四川第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司马相如从小就勤奋好学，学文习武，读书击剑。父母非常喜爱他，给他取了一个表示爱称的小名“犬子”。在长辈的教育下，在书籍的熏陶下，他渐渐懂得应该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当时人们常常在闲暇中摆谈一些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他往往听得入迷。蔺相如的大智大勇和为人处事特别使他感动。就因崇尚蔺相如的爱国精神，仰慕蔺相如之高贵人品，他更名“相如”，并以此为荣。

司马相如自幼喜爱文学，尤其酷爱辞赋。汉景帝时，他初入仕途，作“武骑常侍”。可是，做官并非他的理想，施展文才才是他的意愿。一旦知道景帝不好辞赋，不重文学，司马相如对官位也就没有多大兴趣了。恰巧这时梁孝王刘武来到朝中。梁孝王礼贤下士而又喜欢文学，这正合司马相如的心意。于是，他就称病弃官，和齐（今山东东部）人邹阳、淮阴（今江苏淮阴）枚乘以及吴（今江苏吴县）人严忌客游于梁（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在那里同诸侯、游士一起相处了几年。邹阳是汉初的散文家，枚乘是汉初的辞赋家，严忌即庄忌，也喜好辞赋。他们对司马相如

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枚乘，以赋名世，有《七发》等名篇，后人将“枚马”并称，就是指枚乘和司马相如而言。在梁地生活的几年中，司马相如致力于辞赋的写作，著名的《子虚赋》就是这时写成的。

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成都。他家贫无以自业，经过素与相善之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王吉的劝说，往舍都亭（临邛城附近的亭舍）。

临邛这个地方盛产盐和铁，酿酒业也相当发达。这里有不少富商，卓王孙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卓家有僮客（奴婢）八百人，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财主们听说县令来了贵客，都想好好款待一番。有一天，卓王孙在自己家里宴请司马相如，并请王吉作陪。王吉和其他客人都已到齐，可就是不见司马相如。时至中午，主人又派人去他的住地拜请，司马相如谢病不往。县令不敢先食，亲自前往迎接，司马相如才勉强来到卓家。他不卑不亢，风采不凡，众人皆为倾倒。席间，客人们酒兴正酣之时，县令上前进琴，对相如说道：

“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司马相如辞谢了一番。但他曾经听说卓王孙有个女儿卓文君，是个美貌端庄、既懂文学又好音乐的女子，不幸年纪轻轻就寡居娘家。于是他应县令之请弹奏主人家里的绿绮琴，借琴声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司马相如本是个颇有文艺修养的才子，他奏出的《凤求凰》，悠扬而沉郁，婉转而情深。他那潇洒的举止，娴雅的表情，无言的叹息，幽婉的琴声，都被卓文君隔着帘子悄悄地看见了，听到了。卓文君聪慧，温柔，勇敢，坚贞。她曾读过《子虚赋》，这篇文章浩荡的气势，绚丽的文采，曾经激起过她感情的波澜，因而她早就十分钦佩司马相如。眼前，正当她处于郁郁寡欢的时候，司马相如的琴

弦拨动了她的心弦，她怎能不被那感人的琴音所动，又怎能不对那弹琴的人而倾心呢？但是，她父亲不同意她和司马相如结合，甚至骂她是逆女，希望她早死。压力再大，可是文君并没有屈服，她蔑视传统伦理，不为世俗羁绊，终于在一天晚上勇敢地冲破了藩篱，夜奔都亭，见到了司马相如。相会之后，互表衷情，即一道逃往成都，结成了终身伴侣。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成都后，“家徒四壁”，日子越来越过不下去了。本来，在到成都之前，文君曾留给父亲一封书信，恳求他顾念父女之情，给女儿一点陪嫁之资。但卓王孙竟把信撕得粉碎，大发雷霆：“女不才，我不忍杀，一钱不分也！”文君久久不乐。两人经过商量，由成都返回临邛，把仅有的车骑卖掉，在临邛开了一个酒店。文君当垆（垒土为垆，安放酒瓮，人坐垆边）卖酒，相如在店中做些洗涤酒器的杂活。卓文君亲自当垆的举动，轰动了临邛城。卓王孙知道了这件事，感到是一种耻辱，独自愤懑，闭门不出。这时，他家的叔、伯、弟、兄们纷纷劝他说：“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才分予钱财僮仆，作为给女儿的陪嫁。不久，文君便与相如离临邛归成都。如今邛崃的“文君井”，据传就是当年卓文君临邛当垆卖酒时用过的井。用这口井里的水酿出的酒，清醇可口，人们把它命名为“文君酒”。现在，邛崃酒厂生产的“文君酒”，已成为四川的一种名酒，受到广大顾客的欢迎。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受卓家钱财重返成都后，便买田置宅，成为富户。不过，他们仍不忘读书和写作。当时相如的《子虚赋》已经传到朝中，连汉武帝也读到了。有个主管天子猎犬的狗监蜀人杨得意，与司马相如同乡。有次武帝读了《子虚赋》，极为赞

赏地对杨得意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杨立即回答道：

“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于是召司马相如入京进见。

在武帝面前，司马相如介绍了自己的《子虚赋》，并说本篇不过是叙述诸侯游猎之事，不足为观，请为天子作游猎之赋。遂为《上林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典型的汉赋，也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两赋虽不写于同一时期，但内容相接，形式相连。因此，《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并作为一篇。赋中假托三个虚拟的人物：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的对话，反映诸侯天子的生活，以楚齐领主游猎生活作陪衬，铺陈汉朝皇帝的游猎景况。《子虚赋》假设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之大和楚王在云梦游猎的盛况，乌有先生却指出他“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并把齐国又夸耀一番。《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夸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壮观非楚齐所能相比，最后又归结到反对奢侈淫靡。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指出的，“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

《子虚赋》、《上林赋》通过宫苑游观的描述，歌颂了西汉王朝的富有和强大及其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这在当时面对削弱诸侯割据势力和抗御匈奴侵扰的形势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作品主要在于夸耀帝王的物质享受，宣扬贵族的骄奢富豪，其所谓讽谏，也不过是“劝百而讽一”。但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剥削者腐朽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就艺术形式而言，结构宏大，气势宏伟，语言工丽，

铺叙细腻。作者写子虚夸楚，先说“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接着运用夸张的手法写云梦的规模，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盛况。而乌有先生却以齐王“观乎成山，射乎之罟，浮渤海，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从而压倒了楚国。最后亡是公则又以汉天子在上林苑游猎的壮观压倒齐楚。如此步步推进，层层渲染，波澜壮阔，较之枚乘的《七发》更为突出。司马相如精通文字学，词采富丽。兼之又运用大量的对偶和排句，把自然景物之美描绘得有声有色。后来李白隐居安陆（今湖北安陆县），也深深被这篇赋所描绘的云梦景色吸引住了。

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下，夸奇炫博成了当时赋家的一种风气，其后的扬雄、班固都是这样，尤其是扬雄，他作赋就是以司马相如为楷模的。所以曹子建有这样的话：“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傅不能析，其词非博学不能综其理。”铺陈夸张固然是一种表现手法，但铺张过分则反成累赘，奇词僻字也影响效果。富于文采自然好，但堆砌词藻却不能说不是一种弊病。

武帝在《子虚赋》之后又读了《上林赋》，自然十分高兴。不久，司马相如被命为郎。建元六年（前一三五年），武帝派唐蒙通夜郎、犍中（今贵州、四川境内）。唐蒙在西南大肆骚扰，引起巴蜀民众不满。于是，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处理。司马相如写了一篇《谕巴蜀檄》，晓喻朝廷旨意，稳定民心。相如回朝之后，武帝又任命他做中郎将，出使西南，招抚“西南夷”。司马相如在此行中又作《难蜀父老》一文，假托蜀人的非难，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说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文章宣喻武帝旨意，并借以讽谏。作为使者，司马相如充分发挥了他的雄辩和才智，对

开发西南、沟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写的《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两篇散文，苍劲有力，具有西汉散文的特色；抑扬铺张，颇似战国游士说辞的风格。清代浦起龙说：“谕告篇，于触碍中境开；诘难篇，于怯馁时气旺。”道出了这两篇文章的特点。

司马相如曾作孝文园（汉文帝陵园）令。在《子虚》、《上林》之后，他仍继续作赋。汉武帝好神仙，他乃作《大人赋》。武帝读罢此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闲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因为这篇赋，武帝还特地赐给他锦缎四匹。

他还写过《长门赋》。据说汉武帝的陈皇后阿娇原本得宠，因无子而被遗弃，谪居在长门宫。她慕司马相如的文名，拿出黄金，请他做一篇赋，希望能感动武帝，使自己重新得宠。作者在这篇赋里表现了宫廷妇女失意时那种苦闷抑郁的情绪，一方面写女主人公如何受到冷落，一方面又写她总盼望着君王的再来。富于想象，善于抒情，委婉曲折，语言也相当工丽。这是一篇优秀的抒情小赋，《文选》列为“哀伤类”。司马相如写《长门赋》的事，最早载于《文选·长门赋序》。但因《汉书》本传和《外戚传》中均未记载此事，所以早就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南齐书·陆厥传》载陆与沈约书，其中也有“《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的说法。后来有人估计《长门赋序》是假托之辞，或者认为《长门赋》可能不是司马相如所作。但也有不少人仍然把《长门赋》作为司马相如的作品看待。就文章本身而言，此赋写得曲折细腻，凄惋动人，对后世宫怨闺情一类题材的诗作有过很大的影响。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司马相如有赋二十九篇。但其

赋作大都失传，现存的只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和《哀二世》六篇。后两篇也有人疑为伪作，但从内容和笔法来看，出自司马相如之手是有可能的。他的这些作品，以《子虚赋》和《上林赋》为代表，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赋的内容上看，篇中描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篇末则寄寓讽谏，确立了“劝百讽一”的传统，后世赋家相沿成习；而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和虚构人物展开辩论的手法，扬雄、张衡等人也都加以模仿。

据《西京杂记》的记载，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有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可见其作赋时构思之苦，功夫之深！在同一书里，还提到他作赋的原则：“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种认识显然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但司马相如也的确是典型汉赋（骋辞大赋）的完成者，汉赋到了他，吸取各家之长，又经过自己的创造，终于建立了一种固定的格式，对后世赋家影响甚大，所以扬雄说：“长卿之赋，非自人间来，神化之所至也。”又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据《汉书·扬雄传》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以为式。”这里的“雄”即扬雄自指，他的《甘泉》、《长杨》、《河东》、《羽猎》等赋，都是模仿《子虚》、《上林》的。后来的班固、张衡、左思等人的赋，题材虽有所不同，也都直接间接受到司马相如的影响。因此，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说：“长卿之赋，赋之圣者。”鲁迅先生对他在文学形式的创新和语言风格的特色方面给予了“广博闳丽，卓绝汉代”的评价，

这是恰如其分的。

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病，晚年一直住在茂陵（今陕西兴平东）。临死前他还写了一篇《封禅文》（又叫《封禅书》），颂扬“大汉之德”，为武帝作宣传。他的著作原集已经散失，明代人编辑有《司马文园集》。

王 褒

何崇文 □

王褒（前？——前？），字子渊，西汉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县）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活动在汉宣帝时期。

王褒少年时期就善于写诗，工于作赋，对音乐也有较高的修养。汉宣帝时编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提倡歌诗音律，广徵茂材。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有渤海赵定、梁国龚德；其他郡国亦有以茂材进者。当时四川属益州，益州刺史王褒听说王褒有俊才，遂请为诗。王褒写了《中和》、《乐职》、《宣布》诗，刺史十分高兴，命人配以《鹿鸣》歌之。《鹿鸣》为《诗经》古乐仅存的四曲之一，是一种宴请嘉宾时所用的乐歌。用这样的曲调演唱王褒所写的颂诗，别有一种韵味。王褒又为刺史作传，故深得其赏识。上奏推荐王褒有过人之才。于是，王褒作为特别优异的征士，与文学家刘向、张子侨，音乐家赵定、龚德等人一起待诏金马门。

接着，宣帝召见王褒，要他作《圣主得贤臣颂》。这篇文章怎么写，他是颇费了一番斟酌的。构思时他想到了马，所以文中便出现了马跑的“情景”：“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这真是，善御者六辔在手，操纵自如！王褒在此写